

現代社會經濟中的家庭與社區

褚玖玲

【譯按】第二十三屆國際社會福祉會議已於民國七十五年八月卅日至九月五日在日本東京舉行完畢，本中心王培勳主任及楊蓓主任參與其盛，攜回會議資料。該會議之主題為「增強家庭與社區以促進社會發展」，會中學者提具論文頗多，特選刊其中三份論文與讀者共饗。本文係由 Miura, Fumio, The Family and the Community in Socioeconomic Crisis 為主，另參酌 Ozawa, Martha N., A Critical Look at Present-Day Welfare Responses; Omari, Cuthbert K., The Family and the Community in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家庭是每一個社區（社會）的一項制度，也是社會中最小的單元；家庭更是瞭解社區的分析基礎。三位作者（Miura, Omari, Ozawa）均具有共同的觀點，即家庭、社區或有關的政策（服務方案）深受社會經濟情況之影響，社會經濟改變了家庭和社區的傳統功能。三位作者之文章重點則互有差異，Omari 以制度分析法探究家庭結構和關係的變遷，Miura 以功能分析法探討家庭情緒連結和社區互助關係；Ozawa 則以美國經驗說明政策（方案）與家庭、社區之關係。本文係摘譯三篇論文中有關家庭與社區變遷之型態與風貌。

一、以社會福利觀點重新檢視家庭與社區

首先注意到家庭功能變遷的學者是奧格本（Ogburn, W.F.），他認為前現代家庭（即傳統家庭 Pre-modern family）具有七種功能：經濟、地位、教育、保護、宗教、娛樂和關愛。工業化促使了關愛以外的家庭功能「外在化」。另一方面，馬希佛（Maciver, R.M.）則認為家庭功能消失之後，更基本的功能諸如穩定的性滿足、繁衍後代、教養子女和溫暖的家庭環境愈來愈明顯化。亦有人將需求滿足二分為正式管道與非正式管道。有些需求須經由正式管道，部份非正式的功能仍保留在家庭之內，除非家庭能夠滿足需求，否則

亦不成其為家庭。需求的本質和滿足方式因時因地互異，而界定「社會福利」亦有多種方式，如果吾人認為社會或組織性活動是為了滿足社會成員的需求，促進社會成員的自我能力及整合，則家庭可被視之為具有福利尋求功能的基本團體。

「社區」較諸「家庭」更具多重定義。自從馬希佛將「社區」當做是一個社會學名詞之後，「社區」的定義相當紛雜，雖說如此，異中仍可取其同。柏納德（Bernard, J.）提出三個重要的概念，即地理區域、關係連結和社會互動。他亦建議將「社區」與「一個社區」做一清楚的區分。「一個社區」強調居住於某一地方而言，表示一個團體內的社會互動或共同生活區域內人際關係連結等特性。「社區」並不一定指陳某一地區的久住，主要係意謂一個團體的關係連結是植基於社會互動之上。

一九八〇年英國工人團體報告——「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與職務」中指出「社區」是一個具有多重意義的名詞，並且解釋了一個人生活在一個地區後，他會發展不同的人際關係型態，無論個人地位如何或個人對關係網絡的態度如何，當他遭遇困難時，這些網絡就可以提供資訊、實質支援、瞭解和友誼。此份報告又謂構成「社區」基本意義的是正式和非正式關係的地方網絡，以及社區

中個人或集體反應困難的能力。

這份報告區分了「社區」與其他相同功能的團體型式，這些團體的網絡並不侷限於地理區域內，或如該份報告所謂的「利益結合社區」。依據此種定義，家庭可謂是社區的基本型式，是共同生活和親屬網絡共同形成的生活方式，是社區的組成單元，而不是社區的同義詞。

家庭與社區均具備福利功能，當任何團體成員有需求時，這個團體就會提供相互連結（情緒連結、同情等）的支援，即家庭與社區這兩個團體在促進福利方面具有相當重要的角色。

二、工業化與家庭、社區之變遷

在探討家庭與社區變遷之前，我們須確定家庭與社區的今日狀況為何，家庭與社區又面臨何種爭議，並且檢視家庭、社區與工業化的變遷關係。狹義言之，工業化係指工業社會所特有的型態（風貌），其較諸前工業社會（Preindustrial societies）的農業、手工藝經濟大不相同。工業化社會的風貌包括二級和三級產業的成長、工廠和勞工的增加，以及普遍的理性化生產系統。廣義言之，工業化是一種整體的社會文化變遷概念。工業化社會的特徵包括：人口遷移（尤其是流向資本和生產集中的市區）、都市生活方式的擴張、科學與科技發展、保持良好勞動力的教育。這些社會變遷與主要文化（價值體系）的變遷類似。尤其是人的生活與社會行為受到特殊價值體系轉變至普遍體系、賦予價值轉變至成就價值的影響。由此角度言之，工業明顯地影響了經濟、社會與文化，家庭與社區自不例外。

許多研究者追溯家庭變遷的方式——由前工業社會擴大家庭轉變成核心家庭，又探究出生率降低與工業化所引發的小家庭型式。夫妻關係也有了改變；女性的教育普及、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參與社會的機會增多，亦強調配偶選擇。以美國的經驗來看，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變遷大致表現在兩方面：（1）婚姻經濟性的改變。傳統時期，女性缺少工作機會與經濟獨立權，婦女致力於「主內」，丈夫則專注於「主外」，女性結了婚就是信守這種生活方式。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勞力需求急切，部份工作機會開放予婦女參與，演變至今，婦女擁有較多的經濟資源，在婚姻關係中的權利地位與議價籌碼提高，一旦女性

對婚姻不滿，她可以選擇離婚或獨立生活，又間接地造成單親家庭增多及子女與母親同住的比率升高，美國人也在尋找一種新型式的婚姻——平等婚姻。（2）家庭內女性施與受角色的改變。美國家庭向來是供給家庭成員無條件關愛與照顧、連帶責任及避風港，而婦女是家庭內重要的提供者。如今這些都改變了，婦女一旦擔任重要職務，她也必須尋求外在世界中的成功，而這個外在世界講究理性、競爭與個人成功，婦女因此成為家庭內關愛、照顧的施者與受者，婚姻愈來愈被認為是情感的結合而不具備工具性功能，但情感（愛情）並非是永恒的，婚姻也因此變得脆弱。

核心家庭的另一種新的型式是單身父母（或單親家庭）。美國的單身父母一九七〇年時佔一八·八%，一九八五年佔二七·七%；加拿大一九七一年的單身父母比例是一〇%，如今是二〇%；非洲國家的單身父母亦成為新的現象。非洲傳統的婚姻制度下，甚少發生子女與母親組成家庭的情形，如今婦女（包括離婚者、寡婦、未婚者）與子女同住的單親家庭愈來愈多，而非洲社會也逐漸地接受這種家庭型式。

單身父母不僅反映家庭與婚姻的變遷，更影響子女的教養。單身父母無法完全供給子女物質或精神上的支持與需求滿足，導致子女產生反社會行為、破壞行為、酗酒及藥物濫用等；坦桑尼亞的街頭浪子多數來自單親家庭，肯亞也有類似的情形；另外，坦桑尼亞的棄嬰事件也說明了未婚少女懷孕及非婚生子女，導致少女提早面對家庭責任，也使單身父母增加。都市中的低收入單親家庭的生計相當困難，常常處在貧窮、饑餓狀態或從事非法買賣。由於單身父母必須外出謀生，較少提供子女社會化的功能，單親家庭子女的社會化愈來愈借重機構的社會化。又因單身父母受不了都市生活的孤寂，採取母子自盡的解決方法，日本即曾發生此類例子。

工業化帶給家庭的另一個影響是子女方面。工業化（都市化）之前，子女具有經濟性價值——幫忙農事和養兒防老。如今子女已不再參與家庭經濟活動，老人亦可享有社會安全方案所提供的經濟與健康照顧，不再需要養兒防老；子女數與社會安全稅捐、老年年金給付並不相關，選擇不生育子女亦無損失。在高度工業化的美國社會，子女反而變成父母追求利益、職業成功的附屬品。

子女經濟效用降低以後，美國的政府和民間部門尚未設法平衡子女的經濟性價值，設置世界上多數國家採行的兒童津貼，造成福利策略與福利需求之鴻溝，這個「盲點」就是工業化（都市化）的工作至上倫理，工作使得夫妻、父母愈來愈往「外」發展。

曾有部份人士謂子女價值減低之後，子女的心理利益隨之提昇，即子女提供父母新的經驗與刺激，是歡樂的來源、煩惱的消除劑、未來的希望，但這種論調未必盡如理想。在高度生活壓力下的家庭，親子心理關係極易受到傷害，除非子女能够舉止適當、遵從父母擬定的計畫或不製造問題，否則這種心理利益會變成可怕的責任，家庭也不再是情緒穩定和個人發展的場所。

社區也經歷了工業化與都市化的衝擊，其中之一為鄉村社區的變遷。經濟快速發展時，鄉村人口湧向都市；另一方面，大眾社會也帶給大都市區新的問題。鄉村人口突然流失破壞了當地社區已存的生產基礎，終至引發維持生計的困難，最極端的例子就是「鬼鎮」、「鬼村」。又缺乏規劃的人口膨脹產生嚴重的都市問題，例如居住環境品質降低、交通流量和各種污染。這種一體兩面問題更因高速度的工業化（都市化）及低層次的規劃而益形嚴重。

快速工業化的同時，地方社區成員的互助功能（需求滿足）亦減少了。人口外流區域的生產與生活環境日漸惡化，以往支持個人或家屬的鄉鎮生活互助功能的消失了，降低了人口減少區域的生活標準。大都市區域除了擁擠、交通量、污染的問題之外，社區居民的連結（tie）也同樣失落了，人們因此難以應付威脅經濟安全與生計的意外事件。

我們瞭解工業化一方面減弱了家庭的滿足需求功能，另一方面更深深地影響了社區，使其互助的能力失落，結果造成公共服務必須擴張福利標準俾能符合漸增的個人和家庭需求。

三、家庭功能的近代變遷及老人安養問題

本節主要係檢視、比較各國的老人安養趨勢。

日本業已經歷了人口快速老化與工業化快速發展的過程，老人安養成爲一個需要及時採取行動的問題。以家庭的觀點言之，傳統上高比率的老老人與已婚子女同住，照顧老人是爲家庭事件。如今欲保留這個傳統需求滿足功能很困難

，原因是工業化帶來家庭結構與生活安排的變遷，愈來愈多的婦女進入職業行列或家庭以外的社會參與。現有的政策策略強調經濟（財貨）需求的社會滿足，即提供老人經濟安全，但今日面對的是如何反應非經濟性（非財貨）需求。除了醫療照顧、看護、復健和現有的服務或策略之外，更強烈的需求是補充或取代以往由家庭提供的個人照顧的策略，日本自一九七〇年代以來尤其如此。

此外，更應注意改進臥病在床和老年癡呆症患者的居家照顧。除非有足夠的社會捐贈支援這類病人的每日照顧和看護，否則家庭會因此負擔而破碎。事實上，從報紙報導中可知日本女性必須放棄婚姻以便照顧年老的雙親，老年夫妻自殺的悲劇或年老雙親與子女同住，多年來耗費精神的居家照顧也使得子女的健康受到損害。祇要人的壽命增加，四代同堂的家庭中就會有兩代高齡老年人（父母和祖父母）需要照顧。老人安養問題因此成爲一項新的嚴重問題，而社會又尚未充分準備面對此一問題，更擴大了家庭中的危機；福利政策略被經濟不景氣的預算壓力遏制，又使得這個危機更威脅了大多數人。殘障者（尤其是重度殘障者）與其家庭成員亦遭遇相同的問題。

西歐與北美工業化國家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較支持核心家庭結構，家庭功能的變遷改變了家庭成員的需求滿足。老年人大多數係獨居或與配偶同住，少數與子女（尤其是已婚子女）同住。又社會政策方案提供了老人的機構安養，故這些國家的老人較少依賴家庭照顧。西方國家早已設置了所得支持系統（income support system）以保證老人的經濟安全，所得支持系統的成又引導了老人之家與各種服務的需求。這些國家的老年患病人口持續增加，老人安養政策亦日益重要，然而卻又面臨了預算吃緊和經費裁減，欲維持目前水準已非易事，遑論擴充老人服務。

早期工業化國家總人口的一〇％是六十五歲（含）以上的人口，即人口老化現象。若比較新近工業化國家（如南韓、臺灣、香港及其他東亞國家），過去十年來皆顯現了驚人的經濟成長速度。原本這些國家的人口尚未老化，大致上還維持著傳統的擴大或多重家庭。儒家文化背景仍具有強的影響力，因此，老年人與子孫或其他親屬同住，經濟支持和個人照顧仍是家庭的主要功能。近幾年來，快速的工業化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相當劇烈，例如就業增加（尤其

